

# 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法律问题研究

许霄腾, 崔宇琪

(福州大学 法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赋予了公民享有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权利,开创了我国档案法治建设的新局面。但在传统的档案行政管理模式下,档案信息资源的保管方法与共享方式难以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网络电子文件的冲击。因此,完善档案法律法规体系,厘清档案开放利用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加强依法治档工作,才能应对新时代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新要求。

**关键词:** 档案信息; 资源共享; 依法治档

**中图分类号:** D9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9) 01-0060-07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9.01.010

## The Legal Issues of Archiv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aring in China

XU Xiaoteng, CUI Yuqi

(Law School,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China 350108)

**Abstract:** The archives law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evant provisions endow citizens with the rights to share the archives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create a new situ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es legal system in china. However, under the tradi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mode, the storage methods and sharing methods a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impact of network electronic docum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archives,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 use of archives and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strengthen archives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law, so as to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archives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aring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archiv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archival management by law

### 一、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内涵

#### (一) 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法治价值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将档案定义为“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明确了档案的法律概念。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档案的法律意义和价值,我们需要从档案产生和发展的角度,联系档案的社会价值和法治价值来了解档案本质。

档案记录的信息资源包括人类各种经济、政

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原生第一手信息,是衍生信息资源共享行为的首要渊源。档案全面、详细、真实地记载了人类各种文明信息,是现今社会中政府、企事业单位、个人行为不可或缺的信息资源。伴随着人类社会步入全球化、网络化、大数据化的时代,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个高效互通的信息环境也在加速形成,调整档案法律关系的法律文件也逐渐彰显其重要性。网络化、数字化的信息环境促使社会实践空间极大拓展,社会关系更加复杂,从而影响并改变了传统的档案法治观,档案法治具有新的内涵与开发利用价值,档案资源

收稿日期: 2017-12-01

**作者简介:** 许霄腾 (1994—), 男, 福建云霄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  
崔宇琪 (1993—), 女, 山西大同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

共享在法律层面更加丰富和透明。例如,就档案资源共享有关的法律客体而言,其涉及物权法规制的有形资产和相关权利证明,也涉及知识产权法规制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等无形资产。档案彰显的凭证作用进一步突出了其重大的法治价值。

## (二) 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社会价值

人类实践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档案价值也具有历史性与相对性,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对不同个体,其价值会有所不同、有所变化。但是,无论其保存价值如何,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社会价值大致可分为信息凭证和文化载体两大类。

第一类是作为信息凭证的价值,指档案用于记录相关规则、制度、指令等背景材料信息从而成为特定人群内部的交流与信息共享的合适载体,即特殊的语言工具。<sup>[1]</sup>第二类是文化载体价值,作为重要历史研究、文明传承的材料。现实生活中不断生成的新档案大部分是关注第一类价值,档案凭证价值体现同时期社会信息横向传达,更为当代信息社会的运行提供重要的交流工具,以便我们能够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知己知彼,互补互助。同时,伴随信息凭证价值而存在的档案在时间流逝下可能失去其原有内容,这就需要利用第二类价值,使档案内容得以继承。第二类价值强调保全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体现在纵向的档案原义传递。例如,我国现有的各种档案馆,既有体现第一类价值的房地产权档案馆、社保档案馆,等等;也有为历史文化价值而设立的,如各种历史档案馆、博物馆等;当然,也有兼具两类价值的综合档案馆。

应当认识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社会价值充当社会交流媒介的同时,也是联系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重要纽带。将档案信息资源纳入当前法律体系调整和规范的对象,就在于通过发挥法律的社会作用,更好地保障和发挥档案的社会价值。

## 二、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

### (一) 档案法制建设是前提

档案法制建设是法学领域和档案学领域经久不

衰的课题之一。所谓档案法制建设,就是将国家有关档案法律规定作为档案管理的依据。其一方面表现为古老性,体现在古往今来与档案相伴而育的各类历史文牍;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时代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不断向档案事业提出新的法制要求。<sup>[2]</sup>当前,我国档案法制建设在立法层面,主要包括《档案法》《保密法》,国务院制定的《档案法实施办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各地方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执法层面,主要体现为面向行政系统外部的法定档案信息公开、依申请档案信息披露等具体行政行为。档案法制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不容忽视。

《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规定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保管档案的义务,事实上就是在法律层面将档案作为国家财富加以保护,有效防止档案资源的破坏和流失,通过义务性规范保障档案完整、安全,为之后信息交流与公开创造条件。档案立法确定任何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国有档案享有使用权,规定集体档案和个人档案所有权与使用权不分离,使档案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得到法律保障。通过《档案法》及相关法规,明确了档案行政机关的职权和对国家与社会具有保管、利用意义的档案范围,从而促使相关机构依法履职、依法治档。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等法规中也有相应规定,如1997年《刑法》修订就首次做出了有关惩罚档案犯罪的规定,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增加了“抢夺、窃取、擅自出卖国有档案罪”的规定,<sup>[3]</sup>这实现了对档案违法行为的法律规制,更好地保护了档案资源,确保档案信息共享在合法的轨道上开展。

《档案法》作为相关档案立法原则和规范的总引领,辅之以其他配套档案规范形成一整套档案法律制度。“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治国家以法律为最高权威,因此,只有把档案法制建设作为前提和基础,以档案法治为原则和方向,才能让档案信息在法律框架内实现交流共享,做到合法、合理、透明、彻底的信息公开。

### (二) 档案市场需求是动力

要分析市场存在对档案的影响,就必须站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历史角度上,回顾经济体制的变

革,审视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档案管理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档案管理形成的是“条条管理”体制,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跟国家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缺少经济自主权并且集中由国家统一管理的模式使得包括企业档案在内的各种社会档案的所有权也归国家所有,这种国家统一管理,条条管理的制度是不利于社会档案多元化和信息交流的。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后,市场经济体制随之确立并不断发展,现代企业制度兴起解放了束缚企业法人的枷锁,企业档案乃至各种社会组织档案自主管理成为一种新方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档案工作乃至企业档案发展不再依靠国家行政公权力的力量,而是根据企业自主发展的需要,也是市场需求。

市场经济的庞大需求成为推动档案信息资源不断产生发展、不断保存利用、不断交流共享的不竭动力。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企业是最活跃的经济主体,企业档案是储备市场信息、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载体,在此背景下,档案经济价值更受重视,在市场经济下不间断的竞争推动人们更加注重收集市场信息,挖掘档案经济资源,努力查阅档案以期发现有用的投资信息和商业情报或者以彼此档案的共享来形成竞争优势。市场经济不仅刺激了包括企业档案在内的各种社会档案井喷式出现,出现量的变革,也带动了档案种类愈加繁多。相比在计划经济下档案种类构成多年不变,现代市场竞争下的各种建档、存档领域不断扩大,出现多样化的新类型档案,如资产管理档案、信用档案、健康信息档案,等等。新型档案的出现也产生新的信息利用、共享渠道,如公司法人档案托管机构的出现和运行,这种机构的经营方式也就是新的档案利用管理模式既不同于以往档案行政部门的管理,又不同于企业自主管理,由第三方平等市场主体保管档案、提供服务、收取报酬、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方式,这更有利档案信息共享的平等公正、公开透明。

### 三、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立法问题

#### (一)《档案法》立法宗旨与规范对象的偏差

《档案法》是我国规范档案管理的基本法

律,该法于1987年制定,1996年第一次修订,2016年第二次修订,但是,其中部分立法内容仍然滞后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运行。

《档案法》第2条确立其规范对象为:“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这基本上属于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单位档案。纵观2016年修订后的《档案法》,主要内容依然是归档立卷,国家档案管理、收集、公布等管理业务。同时,立法机关也注意到了当下社会主体多元化,以及相应的档案多样化之趋势,因此,在第2条中加入了“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使其档案立法规范对象不完全局限于公有档案。这种规定使得规范对象的范围和治理目标均存在模糊之处,没有明晰行政权力在公有档案和非公有档案区分规范中的职能边界,而且涉及非公有档案的规定毕竟只是很少部分。从规范对象上看,整部《档案法》侧重于公有档案和现有档案的管理,而在对社会各行业、各专业新档案的形成上,只有一条“定期向本单位档案机构或档案工作人员移交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集中管理”的规定,可见,条文过于简单,不足以应对日趋复杂的档案管理工作。从表面上看,《档案法》涵盖了对全社会档案的法律规范,而实质上仅只是对公有等档案的管理方法,这体现出重公权力而轻视私权利的档案立法观念偏差和档案规范对象的不合理。

现行《档案法》没有区分公有档案法和非公有档案法两部分,更没有界定公共服务档案法与国家行政档案法两个模块。针对国有、集体所有等公有档案在明确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的同时,对于某些重要、特殊或者涉及机要国家秘密的公共档案,没有与国家保密法的相关规定相协调,制定相应的归档、保存和国家特别控制的规定,细化“应当保存”和“应当保密”的具体档案范围。至于与公众生活和公民知情权息息相关的公共档案的相关规范也没有充分考虑档案信息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在联系和区别,例如,《档案法》第19条规定的国家保管的某些政务信息档案的公开期限是30年。同时规定了提前或延后公开的情况,但这些情况却语焉不详,难以操作,在实务中已和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相矛

盾。另一方面, 针对非公有档案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利用共享方法等没有细化的具体规定, 没有形成有关各类社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系统规范。

## (二)《档案法》与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

### 1.《档案法》与《物权法》的矛盾

现行《档案法》是在重国家公权力, 轻个人私权利的立法理念下制定的, 这导致了国家档案行政机构具备更大的权力范围而漠视了对个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割裂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一体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颁布后, 档案立法与物权保护的矛盾更是出现了“违法的合法化和合法的违法化”现象。

档案所有权属于自物权的一种, 具备所有权的基本权能, 但是档案因其特殊性和价值, 导致档案立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档案所有权特别是非公有档案所有权的基本权能, 从而与《物权法》的精神相悖。其法律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加重档案所有人的义务。《档案法》第16条强调档案所有人对档案的妥善保管义务, 这是一项法律强制性规定; 但根据《物权法》对物归属关系的规定, 权利人对自己私有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利, 即使将所有物抛弃也不违法, 《档案法》确定的法定保管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加重权利人负担。

第二, 限制档案所有人的处分权。同样是《档案法》第16条、第18条, 对档案转让、买卖等处分行为进行限制, 更是与《物权法》第39条关于所有权人权利的赋予规定相冲突, 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

第三, 剥夺所有权中的占有权能。《档案法》档案行政机关单方享有的强行征购、集中管理档案的权利, 实际上损害了档案所有人占有、处分档案的权利, 严重轻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 这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个人乃至集体档案所有权, 体现了《档案法》与《物权法》在立法宗旨和内容上的冲突。

### 2.《档案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矛盾

在全社会信息共享领域, 档案信息与政务信息

都是其中重要的资源, 同时档案信息中又包括大量的政务信息资源, 因此, 档案公开与政务公开互相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制定, 为了实现信息公开规范化的需要, 第一次将信息公开作为政府的法定义务<sup>[4]</sup>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以人为本的宪法精神和现代法治理念。同时, 它与《档案法》之间的联系和冲突日益明显, 甚至有些档案立法规定已经成为《条例》实施的障碍, 制约了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

《档案法》与《条例》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表现在内容上的冲突。《档案法》第1条明确档案立法首要的目的是档案保护和管理, 其次才是档案公开和利用。在这种背景下, 整部《档案法》其实是一部档案管理法, 大多数条款是档案条款, 而档案开发条款寥寥无几, 由此确立的“不公开为原则, 公开为例外”的被动开放思想与《条例》内容明显冲突。《条例》确立的是“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的主动公开理念。<sup>[5]</sup>《条例》第1条、第5条明确该原则, 第9至第12条更是详细规定了应当公开的各级政府信息范围。这彻底扭转了以往的保密意识, 观念上在于追求信息公开范围不断扩大化, 保密范围尽量减少化。

两者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体现在对于法条竞合下法律适用的矛盾。档案信息和政府信息法律适用的冲突节点在于政府信息归档后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指出: “已经移交档案馆及档案工作机构的政府信息的管理, 依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执行。”这不能体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及时性和透明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出台的《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 “政府信息由被告的档案机构保管的,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但该条文只是规定了保管在各级行政机关内设档案机构的档案信息应适用《条例》, 而对于归档到档案馆的政府信息应如何适用法律问题, 依然没有规定。比如, 根据《档案法》规定, 原来公开的政府信息在归档后重新

进入30年的封闭期,满30年后再开放,这就促使一些行政部门为逃避公开职责,在受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将未满保管期限的政府档案移交至档案馆,利用30年封闭期的规定避免信息公开,由此产生巨大争议。<sup>[6]</sup>

(三) 对于网络时代新型档案载体缺乏有效的规定

国际档案理事会电子文件委员会对电子文件的定义是:“一种通过数字电脑进行操作、传输与处理文件”。<sup>[7]</sup>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产生了各种形式的电子文档,以此为基础的电子档案作为新兴的信息载体使得以往纸质卷牍式的管理方式、管理体制、管理意识受到全面挑战。目前,《档案法》有关电子档案的规定几乎为零,许多旧的规定也已经暴露出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立法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电子档案的法律地位和效力”缺乏相关依据。长期以来,档案信息与物理载体(棉帛、纸张、金属器、陶瓷等)紧密结合,其固定不可脱离的属性形成了“原件”的概念,保证档案的原始完整就保证了档案的凭证价值。由于原件的性质,一旦改变,信息必然表现为载体的变动。相对纸质等物理档案,电子档案的表现方式不再固定化,不同载体下信息的传播途径和表现形式截然不同。《档案法》更是缺失了对电子档案法律地位和法律证据效力的有关界定。在国内法规缺少对由电子文件产生的档案的内涵和外延的概括时,或许国外的立法经验能为我们提供指导和启发。美国法学界认为,如果电子文件的任何可视方式输出可准确反映电子文件本身,则可被采为证据。<sup>[8]</sup>加拿大也规定:符合特定管理方式产生的电子文件具有完整价值。<sup>[9]</sup>因此,我国《档案法》亦可借鉴相关表述以确定电子档案的法律地位,明确其效力。

第二,对“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利用、公布”缺乏相关规定。电子文件信息需要通过特定计算机系统或者特殊的程序代码才能查找数据来源,从而呈现原始信息,为人工所识读,而且能够不断反复地被识别、利用。电子文件的系统依赖性决定电子档案的产生、传播乃至保管后的过程都要

通过计算机程序实现,传统的档案保存管理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电子档案的具体需要。而且电子档案信息脱离载体的趋势在网络互联网下被无限放大,信息资源不再需要对原记录载体“从一而终”,信息资源脱离物理载体不断传播与共享,在实现高效信息互动的同时,也使得网络安全、信息爆炸、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成为《档案法》亟待规范的法律空白。

第三,对“电子档案内容真实性”缺少法律依据。传统凭证档案以其原始载体的性质支撑内容的真实、可靠,正是档案的凭证价值受到广泛认可,才使其成为人类文明记忆的载体、成为强大知识文化储备、成为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新兴的电子档案信息无固定物理位置、内容易变等特点导致其真实性和法律效力受到质疑,在涉及法律证据层面时,更需要保证其公信力。因此,亟待《档案法》对如何保障和确认电子档案的真实内容和法律效力加以明确规定,制定具体、可行的法律操作手段。

#### 四、完善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法律途径

##### (一) 完善档案法律法规体系的构想

档案立法的逐步完善为依法治档树立准绳和标尺,也是法治档案改革和推动档案信息共享的重要基石。完善档案立法,就要从立法范围和立法内容入手,即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保证档案管理有法可依,通过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为依法治档提供制度保障,不仅要立足基本国情和档案建设的实际情况,弥补立法空缺,扩大立法范围;也要运用完备的立法技术和其他立法例,促进档案立法内容与时俱进,提高立法质量。

档案信息的内容涉及诸多领域,包括国民经济、科技成果、公共政策等,广泛的影响领域决定了档案立法范围需要注意到各方面不同的立法环境,根据实际需要和现实环境的不同,进行档案法律法规的修改、补充等工作。比如,在地方档案规范性文件的修改中,要特别注意将当地实际发展情况和法治环境相结合,梳理地方档案工作经验,采取针对性措施,例如:制定地方档案立法、立规中期规划,分轻重缓急逐步推进修订工

作, 通过分阶段努力使档案规范覆盖档案工作的各领域, 使得国家有关档案立法的原则性规定在特定地方行政区域内化为可供实际执行的地方法规。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下, 我国应尽快完善档案立法工作, 应尽早制定有关网络信息领域和新电子载体档案的法律规范。只有推动档案立法与时俱进, 才能在档案信息电子化、数据化的基础上为档案信息共享开辟更具合法性、真实性、公开性的途径, 使档案管理服务现代化顺利开展, 推动法治社会下面向全民服务和适应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信息共享。

在扩大立法范围的同时, 也要注意立法质量的提高, 这是各档案法规内容和相互之间系统配套衔接, 是实现更高层次的依法治档的重要保障。提高立法质量需要运用相对完备成熟的立法技术, 采纳更加科学、合理的立法体例, 如对应予以严格保密的档案同时加以列举式和概括式的规定, 明确其范围。同时, 注意解决法条竞合问题, 如内部法律法规之间与其他规范性文的矛盾, 从而形成科学、完备、客观、公正的档案立法内容。当然, 立法创造的内容最终是为了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 因此决定立法质量高低的关键离不开民主立法的机制保障, 需要通过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实现档案立法集思广益, 协调各类社会主体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可能产生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保障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追求。档案立法改革要立足于公开透明、服务为民、利益协调的原则, 调整好各类社会主体特别是档案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可采取一些具有针对性的修改举措, 如对于《档案法》中非国有档案所有人承担的法定义务过重而享有的权利过少的现状, 可通过具体法规适当缩小严禁公民倒卖所有档案的范围和非公有档案接收征购收购的范围; 同时赋予档案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在档案部门不作为或者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可主张的救济途径, 包括行政复议等救济方式。

## (二) 档案开放利用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衔接

新时期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开展, 要求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结合, 特别强调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在新形

势下, 要实现档案信息共享在法律体系下的合法、合理、公开透明, 就需要将政府档案工作和依法行政的要求结合起来,<sup>[10]</sup> 因为依法行政的核心观念是: “将权力关进笼子”, 即让行政权力的活动范围限定在法治框架内, 法无授权不可为, 法定职责必须为。做为行政行为之一的档案行政行为, 也必须坚持依法行政的核心要求, 加强档案依法行政, 即依法治档。

首先, 要立足依法行政的前提是打造“阳光政府”。传统的人治观念反映在档案管理领域体现出诸多问题, 包括: 轻视广大公民、法人法律权利的保护并且过于强调对档案的行政控制; 档案执法工作不依法开展、相关行政人员只追求业绩政绩而忽视实际效益; 政策朝令夕改等问题。在强化依法治档的过程中, 要注意树立服务意识, 改变以往行政控制的管理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 办事为民”的服务型政府理念, 拓宽档案服务领域, 增强档案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 实现集阳光政务、行政审批、便于民的服务一体的政务服务体系。

其次, 要健全档案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建设。在当前政府职能转变, 不断向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法治政府发展的前提下, 坚持改革档案管理体制, 处理好政府行政职能与档案馆公共服务职能的关系, 实现设置合理、职能清晰、积极作为的服务体系, 避免当前一些档案馆等相关档案管理机构存在职能交叉、功能不明、怠于服务等现象。法治政府要求将立法、决策、执法、监管等行政职能分离并严格依法开展相关活动。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是确保依法决策的重要基础。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步骤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集体讨论、合法性审查纳入其中, 在与社会大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档案决策中, 除依法应当保密外, 都应向社会公示, 进行广泛听证, 坚持经过民主、合法的可行性审查确定相关档案决策, 这不仅是打造阳光政府的要求, 也是推进政务公开、保证信息共享的重要途径。毫无疑问, 对最经常且容易影响公民知情权、隐私权等个体权利的是行政公权力, 在法治社会下要保障公民权利, 就要切实防止行政权的滥用, 以法律的最高权威限定公权力的活动范围, 越界即无效, 违法需担责。通过着眼

于行政权力实施过程中的制约和监督,建设真正合法、合理的档案公开机制,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档案权益和档案需求。

### 五、结语

我国档案法制的历史源远流长。第一部《档案法》已颁布 30 余年,相关法律的实施为我国社会治理提供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今,社会资源共享日趋频繁,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大背景下,档案信息资源依法依规共享成为档案法治的必然要求。不过,在创新立法理念、完善法律框架和适应新载体等方面,还任重道远。

### 〔参考文献〕

- [1] 张晋周. 档案法治体系探究 [J]. 档案学研究, 2015 (4): 46.
- [2] 冯惠玲. 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5 (1): 97.
- [3] 全其宪. 《档案法》与《刑法》衔接视域下档案犯罪刑事责任重构 [J]. 档案学研究, 2015 (5): 55.
- [4] 张记铭. 浅析档案管理现代化 [J]. 黑龙江对外经贸, 2010 (5): 105.
- [5] 章剑生. 阳光下的“阴影”:《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不公开事项”之法理分析 [J]. 政法论丛, 2009 (6): 16.
- [6] 车炼钢, 倪永春, 白云. 涉民档案管理与服务中的隐私权保护 [J]. 中国档案, 2013 (7): 36.
- [7] 何振, 蒋冠. 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核心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以湖南档案信息化建设为例 [M]. 湖南: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08: 90.
- [8] ELIZABETH D. Archival sources for legal biography at the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J]. Leg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4 (1): 34-36.
- [9] JEAN Dryden. Copyright issues in the selec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 for internet access [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08.
- [10] 马仁杰, 张浩. 论社会转型期档案信息化与档案信息伦理建设 [J].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1): 147.

